

批判梁思成先生的唯心主義建築思想

劉敦楨

梁思成先生多年來從事中國建築的調查研究工作，除在清華大學建築系任教外，解放後又主持北京的市政建設。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它的城市規劃與審批圖樣的方針，無形中為全國各城市取法的標的，而梁先生的著作很多，流傳很廣，對建築創作思想與技術方面都發生一定的影響。但今年二月建築工程部召開全國建築設計與施工工作會議，揭發了近年來以梁先生為代表的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傾向，在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的藉口下，不問客觀需要與物質條件，單純地模仿古代宮殿廟宇的外形，使用大量豪華裝飾，以致國家建設事業遭受到很大損失。不但如此，這種片面強調藝術忽視適用經濟和技術條件的錯誤偏向，在本質上是反馬列主義的，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危害性將無法估計，所以無論在業務方面或教學方面都須即時糾正這種極不健康的現象。如果有人認為宮殿廟宇式建築仍然有它的優點，不過違背今天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節約原則，將來隨着國民經濟發展還是可以大量使用，那就大謬不然。因此，在揭發目前不合理的現象以後，必須進一步徹底批判產生這種現象的思想根源，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從前我在中國營造學社曾和梁先生一起工作了十一年，我有不少和他相類似的思想，所不同的只是程度問題。今天分析梁先生的建築思想，加以嚴肅地批判，可以使自己提高認識，從思想上劃清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和無產階級唯物主義的界綫。不過我的思想水平很低，分析問題不可能很正確，提出的意見更難免錯誤，希望讀者和梁先生給以指正。

梁先生的學術活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最初在中國營造學社時期，調查遺蹟並研究古代建築的法式和做法，企圖完成一部中國建築史。其次，解放前後倡導歐美資產階級最腐朽墮落的世界主義建築的抽象構圖。最近幾年又提倡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的建築。不過以法式做法為出發點的結構觀點，却始終一貫沒有多大改變，只是解放後在學習蘇聯的名義下，披上建築藝術性思想性和民族性的外衣而已。本文為篇幅所限，只對後一階段提出初步的批意見。

由於工作崗位南北遙隔，對於梁先生近年來在教學方面與市政建設方面的實際措施不甚了解，因此只能根據梁先生最近的著作作為批判對象。這些著作大體可分為建築史、建築創作、保存古代建築紀念物、和城市計劃四類。其中除城市計劃本文不擬討論外，關於中國建築史方面的問題，梁先生採取的研究方法不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因而不能正確了解中國社會的發展經過，反而產生了一些本質上與社會發展規律相抵觸的錯誤

觀點。結果，把中國建築看成為一種成就很高幾乎可以永恆不變的藝術，不但適於過去，而且適於今天。我認為這種錯誤觀點是構成梁先生提倡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建築的理論根據，應該詳細討論的。其次，關於新中國建築的創作問題，梁先生輕視適用與經濟技術三個基本因素，片面地強調建築是藝術，藝術應該是民族形式，民族形式的精華是古代的法式和做法，從而號召大家必須應用這些法式做法，為今天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而服務。這種主張只是把前述錯誤的歷史觀點引申到實際工作方面而已。關於保存古代建築紀念物方面，梁先生提出所謂『古今兼顧新舊兩利』的方針，而在實際工作中幾乎為保存而保存，反對改變原來城市的面貌，嚴重地妨礙今天人民的生活需要和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以上三類文章有一個突出的共同特點，就是脫離現實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貫徹到任何文章裏面。以下依着這三類文章的順序，提出我的不成熟意見。

二

大家知道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曾經有過多次劃時代的巨大變革。這些變革決不是任何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而是這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矛盾，用各種不同方式的階級鬥爭來解決的。可是最近建築學報第二期登載梁先生和林徽因、莫宗江二先生合寫的「中國建築發展的歷史階段」一文中，竟把中國封建制度的起原，說成為周文王的祖父太王的裕民政策。這種說法不僅和社會發展規律不符合，並且模糊人們的階級鬥爭觀念，是異常有害的。其次，中國社會的發展，毛主席「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早已指出『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據我很幼稚的體會，毛主席所說的『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可能包括下列兩方面：就是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除了表現人民的力量使繼起的封建王朝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不得不採取減輕剝削的政策以外，還摧毀了當時一部分豪族地主經濟，出現一批新的小土地所有者，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農村中的生產關係，從而每次改朝換代以後，生產力或多或少地得到發展，把經濟和文化推進了一步。但前述梁林莫三先生的文章，對西漢初期的經濟僅說：『漢初的統治者，採用簡化刑法和減輕剝削的政策，使人民得到休息、恢復了生產』。對唐代則說：『保留了隋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中的一些優點，在李世民在位二十幾年中，確使人民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對宋代則說：『趙匡胤沒有經過戰爭便取得了政權，五代末朝後周在汴梁因疏濬了運河和江淮通航所發展的工商業繼續發展，中原農業生產或得到恢復或更為提高』。對明代則說：『朱元璋……建立了均田農貸等制度，解放了異族壓迫，恢復了封建生產關係，使經濟很快恢復』。當然這些都是事實，我們應當承認的，但僅提到這些，便無形中為帝王們歌功頌德，令人懷疑推進中國社會的主要力量，究竟是統治階級還是勞動人民。由此可見不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考慮問題，往往只看見一些表面的和次要的原因，很難了解社會發展的真實面貌。因為這樣，梁先生對中國建築發展的看

法，也就無可避免地犯上同樣毛病。

梁先生對中國建築發展的論述方法，在中國營造學社時期所寫的調查報告，往往不問社會背景，僅討論各種結構式樣，令人讀了以後，不知道這些結構式樣如何產生和演變的。近年來發表了一本「中國建築史」並寫了幾篇與建築史有關的論文，但所用方法基本上還是一樣。就是在內容方面，主要羅列大批表面現象和式樣技術方面各種演變資料，但除少數例子談到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以外，未把中國建築與中國社會發展有系統地聯系起來，說明建築和經濟政治文化尤其是和經濟的關係，使人由此樹立唯物主義建築觀點，進而找出將來發展的方向，相反地却把人們引向極端錯誤的路上去。因為梁先生不僅把建築孤立起來，並且把論述重點放在建築造型藝術方面，極力宣傳過去中國建築的各種優點與成就，併主張今天還應保持這些優點，這就等於說中國建築的造型是一種超社會和超階級的藝術，不論社會如何發展，它可以維持傳統風格不必作很大改變。這種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錯誤歷史觀點，可以引人醉心過去而忽視現實生活的需要，對今天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必然發生不良影響。事實也是如此，這幾年風行一時的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建築是和梁先生對這方面的提倡鼓舞分不開的。爲了使問題明確起見，引用幾段梁先生的文章加以討論。

關於中國建築在藝術方面的成就，梁先生從前寫的各种調查報告便歡喜誇揚優點，很少予以正確的評價。這種傾向，近年來似乎沒有多大改變。如五一年春天發表的「我國偉大的建築傳統與遺產」一文中，從台基牆壁門窗斗拱屋頂彩畫說到院落的平面組合與城市計劃，認爲都是高度成功的藝術，接着便主張「我們要鞏固我們傳統的優點加以發揚光大，在將來創造中靈活運用，基本保存我們的特徵」。五四年發表的「祖國的建築」小冊子更具體地主張「法式即建築的文法……我們必須應用它，發展它，來表達我們民族思想和感情」。這種論調並見於梁先生的其他文章內，無疑地是他提倡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基本理由。不錯，中國建築經古代無數勞動人民辛勤創作，留下了許許多多雄壯美麗的偉大作品。這些作品的形象特徵，充分表現我們民族的藝術才能和優良品質，成爲國家非常寶貴的文化遺產，應該發揚光大的。可是建築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隨着社會發展而發展，它的藝術形象不可能脫離生產力有關的各種物質條件與人民現實生活的要求，所以談到發展民族形式的具體辦法，便不能隨便應用古代的法式做法，而應了解過去中國建築的各種特徵，大部分形成於農業和手工業爲基礎的封建社會，曾經長期間爲封建統治階級而服務，所反映的都是當時社會的意識形態。今天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已根本改變，經濟基礎不同，服務對象不同，政治要求不同，人民的生活需要也不同，而建築材料與施工方法已從手工業向機械化施工邁進，這就促使人們的藝術標準隨着客觀條件發生很大變化。因而過去中國建築的各種造型特徵，不可能無條件地適應新社會的各種要求，更不能隨便拿來表達今天人民的思想與感情。梁先生的文章對這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問題往往作爲陪襯性質，只是攏統一提，接着便不顧客觀事實，強調過去建築的偉大成就必須珍重愛護予以繼續發展，或者拿與物質條件沒有直接關係的語言文法和建築相比擬，竟主張應用古代的法式做法作爲發展新中國建築的具體辦法。不但如此，梁先生在「祖國的建築」內，還把中國建築的缺點，說成是它的內

容、它的階級局限性和古代落後的工程技術，對於由法式做法構成的藝術形象，則認為是中國建築的精華，主張仍然應用。由此可見梁先生一方面把建築和社會看成沒有聯繫的東西，另一方面又把中國建築的形式與內容分割為對立的個別事物，最後把這絕對化的傳統形式作為今天新中國建築必須採用的式樣，那末，建築的形式既脫離了社會條件，又與它的內容迥不相關，豈不成為無病呻吟的虛偽裝飾。這樣的建築不是違反現實的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建築是什麼呢。梁先生近來雖號召大家學習蘇聯，提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建築，但他提出的辦法顯然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建築背道而馳。

其次，關於中國建築的結構，本來梁先生說過中國古代的工程技術是落後的，但為了宣傳中國木構架形成的造型藝術適於過去又適於現在，不惜改變論調，說這種木構架是先進的科學的結構方法。在「祖國的建築傳統與當前的建設問題」一文中，他首先推崇中國木構架能適應亞熱帶到亞寒帶各種不同地區的氣候，接着便說，『這種構架法正符合現代的鋼架或鋼筋水泥構架的原則，如果中國建築採用這類近代材料和技術，在大體上是毫不矛盾的。這也是保持中國風格的極有利的條件』。當然，我們的祖先最遲在殷代就能夠用較少的木料構成較大的空間，創造人類最早的框架結構法，是值得引為驕傲的。但這種結構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便為歷史條件所限制，停滯不前，如遺物所示，唐中葉以來——實際上可能更早——木構架的結構原則根本沒有多大改進。同時木構架的各個節點、以及木架與基礎、木架與木架間的聯絡很不完全，是無可諱言的重大缺點，所以它受到風壓及其他外力容易發生偏斜等等毛病，必須在木架外側包砌較厚的牆壁使其穩定。可是梁先生竟拿這種結構極不完全的木構架與近代進步的鋼架或鋼筋水泥構架相比擬，無論從結構理論或性能與功用來說，都很牽強附會，與事實無法符合。至於梁先生從空間方面說明這種木構架曾經適應各種不同地區的氣候，雖基本上沒有錯誤，但我們決不能孤立地只考慮空間。如果空間之外再加上時間形成的歷史條件——就是社會發展條件——便知梁先生所謂適應範圍主要屬於過去。因為新中國建築在適用方面的要求，不但超過已往任何時期，而且一天比一天複雜。氣候固然與建築具有密切關係，但不是壓倒一切的決定因素，不能因氣候一項犧牲其他重要部分，何況今天利用各種科學成果不難解決這方面的問題。至於經濟方面，拿近代的材料與技術為原來木構架形成的建築風格而服務，是極端浪費與妨礙建築工業化的辦法，不是毫不矛盾而是極大矛盾，不是極有利而是極有害。

梁先生為什麼這樣熱愛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建築藝術呢，我以為從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中可以得到正確的解答。毛主席說：『各個階級社會與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別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與不同的藝術標準』。那末梁先生的藝術標準是什麼呢，他在「我國偉大的建築傳統與遺產」一文中坦白地說過：『我們家鄉的一角城樓，幾處院落，一座牌坊，一條街市，一列店舖，以及我們近郊的橋，山前的塔，村中的古墳古碑，村裏的短牆與三五茅屋，對於我們都是那麼可愛，那麼有意思的。它們都曾豐富過我們的生活和思想，成為與我們不可分離的感情的內容』。這段短文中別的不說，單就那些舊式街市店舖和鄉村中的茅屋以及妨礙交通的牌坊與不適合今天交通條件的舊式橋梁等等而言，難道不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逐步改革的對象嗎。可是梁先生却

如是流連熱愛，可見他的感情與藝術標準，不是今天社會主義建設工作者所應有而是屬於封建社會的。因為這樣，他不從現實需要尋求新中國建築的發展方向，反而向古代傳統藝術中找出路，正是這種深厚的封建社會感情和由此產生的藝術標準的必然結果。

梁先生在好幾篇文章內，一直誇耀中國建築是世界上最古老最長壽的建築系統。至於中國建築為什麼能夠三千多年維持一貫系統的原因，梁先生提出下列兩個理由，我以為是值得討論的。

第一個理由，梁先生在「中國建築的特徵」一文中說：『在中國，則因很早就創造了先進的科學的梁架結構法，把它發展到高度的藝術和技術水平，所以雖然也發展了磚石建築，但木框架還同時被採用為主要結構方法。』這裏首先應當討論的，就是唐與北宋時期，中國木架建築的造形和用料標準以及施工方法確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比同時期的歐洲木建築先進了一步，可是社會不斷向前發展，我們的建築是否繼續保持先進的地位呢？如果不是，便不能構成長久使用這種結構法的理由。我以為解決這問題，除了對中國建築本身的優點和缺點須作正確評價以外，主要應該從過去的政治經濟有關的生產方式和人民經濟水平等方面綜合研究方能得到比較正確的結果。大家知道中國建築發展於封建社會，所以當時的主要建築只是保守性較濃厚的宮殿苑囿陵寢祠廟寺觀和住宅園林等等，而生產方式却長期間停留在農業和手工業的階段，房屋內部不需要十分高大的空間與承載很大的活荷重，更無須考慮這空間內由活荷重引起的震動變換破裂偏斜崩潰等等事故，因而這種木構架除了詳部手法曾作若干演變以外，它的結構原則根本沒有變更。換一句話來說，木構架所以長期間使用的原因，主要由於過去社會不要求它作巨大改革。其次從一般經濟情況來說，我國的木構架能以較少的木料構成較大空間，比磚石結構更能經濟地解決人民的居住問題，所以無論統治階級的宮殿邸第或一般人民的住宅，基本上都使用木構架。不過木架外側，因居住者的經濟狀況不同，有些使用磚牆，有些使用土墻或版築牆，有些竟用竹片柳條或高粱梗編為壁體，表面塗泥，而在雨量較少的地方，為節省木料起見，使用平頂岡頂每一面坡頂。此外在河南山西陝西甘肅等省木料缺乏的地區，就只得利用天然深厚的黃土層營造穴居式的窑洞。由此可見政治經濟對建築的結構式樣具有異常重大的影響，可是梁先生只孤立地在木構架本身找原因，所得結論自然不夠全面。

第二個理由，梁先生在「祖國的建築傳統與當前建設問題」一文中提出如下意見：『我們古代的匠師們善於在自己傳統的基礎上適當地吸收外來的影響，豐富了自己，但從來沒有因此而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梁先生可能想拿古代匠師們尊崇自己的民族特性作為榜樣，鼓舞大家為發展民族形式而努力，但却犯了不合事實的毛病。因為六朝以來許多磚石建築雖曾採用木建築式樣，可是六朝以前，就是印度波斯西域諸國的文化還未大量輸入中國以前，漢代石造的墓闕和墓祠以及墓內的柱與斗拱等何嘗不是採用木建築式樣。可見拿木構架不改變的原因，歸功於古代匠師們保持民族特性的崇高精神，顯然是證據不充分的唯心主義論調。關於這點，不但梁先生如此，我在五一年春天寫的「中國的建築藝術」也採取同樣說法。五四年以前，我無論講課或在各處做報告，還時常提出六朝以來的磚石塔與這種錯誤論點相印證，無異鼓勵人們犧牲現實需要和材料技

術去模仿古代建築的形式，對於新中國建築的發展是異常有害的。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歷史問題應當討論，因為篇幅關係，留待將來再仔細商榷。

三

梁先生近年來對新中國建築的創作問題，強調建築的藝術性、思想性、和民族性，並提出民族形式必須應用古代的法式與做法一系列的具體主張。但很遺憾的，梁先生未將建築和社會條件密切聯系起來，也沒有把建築最基本的適用經濟和技術三個因素放在主要地位，相反地把建築的藝術性提到第一位，結果，他的主張自然脫離實際，不符合今天國家建設的需要。現在依着梁先生所主張的順序，先討論建築的藝術性。

人人知道，從原始社會到今天，建築的主要目的無非供人們的居住和生產。它的基本要求，應該是居住和生產上的舒適、方便、與安全。如果這些要求不能得到適當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一定感到不便甚至引起困難或危險。同時建築是用人力和物力建造起來的，任何生活要求如果不通過技術與生產力有關的各種物質條件，絕對無法成為事實，而一般來說，它們不可能無限度地滿足人們的主觀願望，這就迫使人們只能在經濟技術許可範圍內先解決適用方面的要求。因此適用技術與經濟有關的物質條件是構成建築內容的主要成份。至於建築的造型是在適用經濟和技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美的法則是在這基礎上經過無數勞動實踐逐漸提煉出來的。如果離開適用經濟和技術而追求形體色調的美麗，正如中國一句老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切將毫無根據。因此建築的形式只有忠實地反映適用經濟與技術形成的內容，在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客觀條件下作不同的藝術處理，才不違背現實生活的意義。不過所謂藝術在大體上雖指人民愛好的民族形式而言，但應該注意的，同為適用，今天和過去已根本不同，而經濟與技術條件改變得更為厲害，如果機械地搬用傳統式樣，必致形式和內容無法調和，所以在運用以前，必需經過一番批判選擇，同時並須吸收其他民族的優點，截長補短，然後創造出來的形式才可以和今天建築的內容獲得統一，而形式本身也可健全地不斷向前發展，成為富於創造性的藝術。可是與此相反的便是古代統治階級，一方面為了窮奢極慾的享受，另一方面企圖在精神方面鞏固他們的統治，不惜浪費人力物力，建造了許多規模宏大的宮苑陵墓廟宇等等。這些建築雖然是當時勞動人民用智慧和血汗累積起來的寶貴成績，有很高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但無可否認的，當時統治階級的主觀願望，曾對這些建築起了相當作用，因而它們的平面佈局與形體色調，有不少部分不顧適用經濟與技術條件，成為虛矯誇大的形式主義建築。這種建築的宏大規模與輝煌壯麗的外觀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量，人們如果無批判地接受、無形中可養成脫離現實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觀點。梁先生平日醉心這種建築並對它具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忽視適用經濟與技術，片面地強調建築的藝術性，終於成為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倡導者。

其次。關於建築的思想性，梁先生在「建築藝術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民族遺產的學習與運用問題」中主張：『建築……是反映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它對於物質基礎起着積極作用，它是改造世界的一種工具』。當然這話是對的。不過問題不僅在介紹蘇聯的先進理論，而是用什麼具體方式反映新中國社會的生活和社會的意識形態。斯

大林同志說過：『社會精神生活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反映。』，那末我們的建築就應該毫不虛偽地反映今天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各種物質條件的真實情況，方能對社會歷史起應有的作用與意義。現在祖國爲了建設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正集中一切力量，從事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在建築方面，除了目前興建的各種廠礦和與此有關的新型城市以及難於估計的居住建築和公用建築以外，將來隨着經濟發展，還須逐步改進各處舊城市與提高全國六億人口的居住水平。我們的任務如此光榮偉大，我們的工作也就十分艱巨，尤以我們國家的生產力因過去的底子太差，短期內還不能完全適應今天建設方面的要求，因此只有少數特殊建築必須滿足它的藝術需要以外，一般建築就應該嚴格遵守『適用經濟並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的方針，用最經濟最迅速和最妥善的辦法，也就是施工機械化的辦法，方能完成這異乎尋常的艱巨工作。不但現在如此，就是將來國民經濟逐步上昇，也只能採取逐步提高的方式才符合全體人民的長遠利益。假使大家實事求是做到這點，那末我們的建築定能表現這偉大的歷史階段中人民艱苦奮鬥的精神與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真實面貌，成爲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紀程碑，無論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可發生很大作用。但是梁先生不顧今天一部分人還缺乏可住的房屋，和一般生活水平與國家的物質條件，竟號召大家應用古代的法式做法，建造許多宮殿廟宇式的學校旅館醫院宿舍辦公樓等等。這些建築所反映的不是今天人民生活的真實情況，而是和它不相稱的奢侈浪費作風，以及分散國家建設力量的不合理現象。試問在思想方面除了發生反作用以外還能起任何積極作用嗎。那末梁先生提倡的建築思想性豈不完全落空。在這點上，又證明梁先生提出的具體辦法和所引用的理論背道而馳。

再次，關於建築的民族性問題，我們應該遵照毛主席指示的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方針作爲一切行動的標準。不過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能只顧民族的而忽略了科學的和大的，所以過去任何最美好的式樣，只能算爲過去的，如果今天想拿來應用，必須用這三個原則去批判研究，沒有不適合的地方才能算得是精華，才可以吸收應用。但是梁先生在「中國的建築特徵」一文中所列舉的九項特徵，竟主觀地把封建統治階級的宮殿廟宇式樣認爲都是精華，而對廣大勞動人民在各地區建築中如何處理不同的氣候材料與各種生活需要而產生的式樣結構和施工方面各種優點，幾乎沒有談到，因此梁先生所舉的特徵，雖然有它本身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但只是過去的中國建築的一部份，不能拿來代表全體，何況它的材料結構與施工方法不符合今天施工機械化與社會主義建設中精簡節約的要求，顯然違反前述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方針。在這點上，梁先生又嚴重地犯了唯心主義的錯誤。

不過梁先生提出的九個特徵雖然不適合今天需要，但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而且又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除了漢族的木構架建築系統以外，還有其他民族的建築式樣，而漢族的木構架建築隨着時間和空間的演變，曾作過多方面與多樣性的發展。如果我們說過去的式樣完全沒有適合今天需要的東西，那又未免過於武斷，而且也不符合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方針。例如屋頂式樣就有十幾種之多，除了宮殿廟宇的廡殿或歇山式大屋頂以外，全國有不少地方使用平頂或平頂與其他屋頂混合的辦法。因此，我們對傳統建築固然不能盲目抄襲，但也不能認爲全部都是糟粕，應當經過嚴格的批判與慎重選擇，

使其適合今天的需要和施工機械化的各種具體條件。當然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但只
要向着正確方向，由調查研究與試作推廣，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我相信定能產生一種
適合今後需要的民族形式，決不會再犯形式主義復古主義或結構主義的毛病。

如上所說，梁先生主張的建築藝術性思想性民族性和他提出的具體辦法，幾乎全部
自相衝突，因此，這些理論除了作為一種幌子拿來為他最愛和最熟悉的法式與做法服
務以外，令人無法找出其他可以解釋的理由。這是歪曲毛主席的文化方針和黨對建築的
路線，也是違反人民的利益的。這種唯心主義出發的形式主義復古主義的建築思想，在
本質上是反動的，必須徹底肅清，不能讓它繼續存在。

四

梁先生多年來熱心於古代建築紀念物的保護工作是值得贊揚的。但最近幾年梁先生
因保存北京的建築紀念物與市政建設工作發生不少矛盾，我以為不僅是保存建築紀念物
本身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對待古代文化遺產的態度與立場問題。前面已經說過，梁先生
由於熱愛過去的建築藝術，因而使他只孤立地注意這些建築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忽
略了因保存而與人民利益發生抵觸。我們由梁先生的「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傑作」
一文，便可看出這個問題。這篇文章幾乎盡了一切修詞上的可能，稱贊北京的城牆、角
樓、宮殿、亭榭、牌坊、店面、壇廟、塔寺、第宅、居民、橋樑等等都是舉世無比的傑
作，並且說它的平面佈局與建築羣的空間組合如何氣魄雄偉，世界上沒有第二個。這些
話完全忘記了作為一個有機體的城市，尤其是正在建設中的新中國首都，不能專談藝
術，不管與人民生活 and 國家建設有關的經濟問題。大家知道北京是明清二代封建統治階
級建造的。它的一切規劃以如何滿足當時封建統治者的利益為前提，例如在內城南部的
中央建造紫禁城，再在它的外面繞以皇城，配以無數莊嚴壯麗的建築羣，確曾達到精神
方面統治人民的目的。但從人民利益方面來說，却存在着許多問題。我們從清代人的筆
記中就可以看出當時住在東城的人，乘着驛車，繞過後門，往西城訪問親友，來回就是
大半天，他們如何在抱怨交通不便，却又敢怒而不敢言。這種情形不但繼續了五百年之
久，就是今天皇城已經拆除、紫禁城與景山仍然橫梗市區中央，成為阻礙交通的因素。
其次，北京的商業區原只有東西單牌樓與東西四牌樓及後門和前門外六處。由於商業區
比較集中，不但購買生活品感覺不便，並且因路途往返引起交通上許多不必要的混亂擁
擠，而這種情形到今天還某種程度依然存在。以上所說的不是故意貶低北京城在歷史上
和文化上的價值，主要說明對待古代文化遺產，應當從多方面考慮它的優點和缺點，然
後才可以得到比較正確的評價，否則可能引導人們不知不覺變成爲感粹主義者。以上不
過略舉一些例子，但就是這些問題，梁先生文章中一字未提，却片面宣傳北京各種建築
紀念物的優點，要維持舊北京的面貌，使它成爲一個博物館，那末一切新建築勢必犧牲
適用經濟與技術去配合舊北京的風格。可見梁先生的思想，過去重於現在，藝術重於現
實生活，不但影響今天人民的利益與正在進行中的首都建設，並且可使一般人對古文物
發生不正確的觀感。

我們國家的建築紀念物，除了已經知道的宮殿陵墓寺廟石窟塔幢宅第園林橋樑等等

以外，解放後由於黨和人民政府提倡保護，又陸續發現了不少寶貴的古建築，像全國最古的木建築——唐中葉建造的山西五台山南禪寺正殿——就是五二年發現的。此外，已往認為南方氣候不好，木建築不易保存，但事實上並不如此。最近幾年內，江蘇浙江安徽等省不但發現三四十處明代住宅祠堂，浙江福建還發現幾處宋元的佛殿，如果以全國計算，數量一定更多。至於保存這大批建築紀念物的方針，我以為在國家集中力量從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時候，只能在經濟許可範圍內，採取分別等級和重點保護的方法。就是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都具有代表性的建築，應該隨時修繕，不使其毀壞，而且不能任意使用。如果位於城市內，最好把它組織到城市規劃裏，使其在文化上能發揮積極作用。次要的，應允許使用，但不宜過份改修，變更原來面貌。不重要的、如妨礙建設或人民生活，應該遷移或拆毀。換一句話說，在原則上，不是為保存而保存，而是使建築紀念物為今天人民利益而服務。但是梁先生在前述「北京——都市計劃無比的傑作」一文中，提出所謂『古今兼顧新舊兩利』的主張，把古今新舊同等看待，可見不是把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看成為當前壓倒一切的工作。而事實上梁先生的行動却顧舊不顧新，遠還超過自己的主張，像北京市許多妨礙交通的牌坊，由於他堅決反對拆除，以致傷亡事件不斷出現，更是不應該的。

五

以上就梁先生最近幾年的著作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但梁先生這種唯心主義的建築思想決不是短時期內形成的。梁先生在中國營造學社時期的研究方法就是片面的、孤立的、和主觀的，因而他的著作中存在着不少錯誤。其中比較嚴重的，如梁先生判斷古代建築紀念物的年代，不是把式樣結構和文獻紀錄、社會條件、以及中國建築在時間空間的演變關係等綜合起來予以研究，而是僅拿結構式樣尤其是斗拱的大小與卷殺形狀作為絕對標準，因而把建築的年代往往判斷得太早。如曲阜孔廟的承聯啓聖二門係明代建造與清代重修，梁先生却斷為元代遺構。又如河北正定縣隆興寺慈氏閣雖建於宋代，可是經後代屢次補修，它的上簷係清乾隆間所重建，但梁先生根據斗拱比例雄大與佈置疏朗，疑心它是宋代物，甚至說它是明清二代假昂的始祖。其次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清式營造則例」的圖版中，不但屋角反翹太高、與溜金斗拱的結構、以及坐斗昂嘴螞蚱頭六分頂菊花頭挑尖梁頭的卷殺都不正確，其餘圖版也有程度不等的錯誤。記得付印時我曾勸梁先生修改，但他回答：『等再版時更正』，於是這書將錯就錯地出版了。可是事過二十年，最近清華大學建築系重印此書，絲毫沒有更改。又如宋「營造法式」這部書本來就未提到房屋的開間與柱高的比例，柱徑也未肯定，而現存遺物又出入很大，可是梁先生主稿的「宋營造法式圖註」中所繪用柱之制與雙槽草架單槽草架分心槽草架諸圖，竟主觀地決定開間與柱高柱徑。這兩部書流傳很廣，不僅業務方面用為參考書，有些學校還採用為教材，我以為梁先生有更正的必要。

梁先生這種唯心主義思想和不忠實的治學態度，當然有他的社會和歷史的根源。但是解放已經六年，六年的時間並不算短，按理，梁先生坦負的工作很多，責任也不小，應該踏踏實實地學習馬列主義，改造自己的思想，可是就他所寫的文章和提倡形式主義

復古主義建築來看，證明他未曾做到這點，結果，使教學上與市政建設上遭受了許多不應有的損失。通過這些事例與初步批判，使我體會到一個科學技術工作者儘管對專門技術有較廣博的知識，如果思想觀點不正確，所產生的有害的作用也比一般人更大。由此可見馬列主義是指導一切工作的準繩。只有認真學習馬列主義，並在實踐中隨時體驗，才能逐步改變原來的舊思想舊觀點和舊作風，做好國家交給我們的工作。